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王永平

[摘要]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关键词]崔浩 南朝情结 北魏 汉化 南士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05-07

一、引言：十六国北朝汉族代表人物对东晋南朝的文化认同及其心态

在北魏历史上，崔浩及其家族在推进鲜卑上层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地位。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崔浩者，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也。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亦胜于胡人，故胡人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之大族亦欲藉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虽成功失败其事非一，然北朝史中政治社会之大变动莫不与此点即胡人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之关系有关是也。”^{〔1〕}(P141-142) 对此，钱穆先生也指出：“北方之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于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于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2〕}(P368) 十六国北朝之汉族儒学大族代表人物之积极进取，推动诸人华之胡族统治者不断汉化，其历史贡献确实不可估量。

不过，在十六国与北朝前期进入胡人政权之汉族儒学大族人物其心态颇为复杂，一是出于根深蒂固之儒家夷夏大防观念的束缚，内心中难免时时忍受着这种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观念上的折磨，这是不难理解的；二是当北方胡人政权强大起来后，必然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流寓王朝即东晋南朝诸政权发生冲突，而在当时民族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冲突最激烈的状态下，东晋南朝之存在不仅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在北方的儒学大族人物看来，还具有民族文化存续的特殊意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进程及更广阔的历史范围看，永嘉乱后中土文化士族的整体性南迁及其带动的华夏文化中心的一度南移，其影响要深远与广泛得多。当时人们以东晋南朝为中国历史承传之正统所系，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出于文化上的认同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中深层的文化认同，他们对东晋南朝政权之兴衰存亡及其文化怀有深切的“理解之同

作者简介 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扬州，225009）。

情”。这种文化心态是当时留滞北方的汉族代表人物内心所共有的，可谓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情结”。因此，对于与胡人合作之北方汉族士人来说，由于为维持家族门第等现实利益考虑，或受到胡族统治者之逼迫，他们必须出仕胡人之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帮助胡人统治者，在客观上减缓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激烈冲突及其对北方的破坏。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时受到文化方面潜意识的折磨，这种深层的内在矛盾心态和情绪，确实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居北方与胡人合作之汉族士人所经受的苦难恐怕比流寓南方之侨姓士族更为严重，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这方面，十六国时期进入羯族后赵政权的张宾与进入氐族前秦政权的王猛的心态便颇为典型。关于张宾的相关事迹，《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载其为赵郡中丘人，父张瑶为晋中山太守，“宾少好学，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永嘉之乱后，张宾见石勒，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逐渐成为石勒之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石勒甚敬之，每呼之“右侯”而不称其名。石勒在立国前曾举军南下，追击南迁的司马氏宗室和门阀士族，在葛陂建立了军事基地。《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业。”当时司马睿之东晋尚未正式建国，处于草创时期，面对石勒的军事进攻，司马睿集团上下十分紧张，在寿春聚结军队抵抗。当时霖雨三月不止，石勒军队损失颇大，必须就进退做出决策。其中孔苕、支雄等30多位将领建议南下决战，首先进入寿春，“得其城，食其仓米”，进而“破丹杨，走江南，尽生缚司马家儿辈”。石勒征询张宾的意见，宾曰：“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石勒由此决定回师河北。张宾的这一主张当然是站在石勒的立场上考虑的，可谓石赵建国的关键决策。不过对于诸将积极要求南下攻打司马睿，张宾在内心里则是不愿意的。如果怂恿石勒南征，虽然未必能够长期占领江南，但以其军事攻击力，必然对司马睿江东政权造成巨大的伤害，并给江东地区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张宾的建议不仅给石勒提供了确实可行的立国方略，也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免遭扼杀并得以成长，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秦时期的王猛表现得更为典型。《晋书·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载猛乃北海剧人，为苻坚夺位、巩固统治、规划北方及其汉化的主要辅佐，兼领丞相、中书监和尚书令等要职。“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所谓“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确为实录。王猛尽心辅佐苻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当苻坚势力不断强大，图谋规划江南时，王猛则表示反对，他在死前明确表达了这一态度：“猛疾甚，因上疏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国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明确指出东晋“乃正朔相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且代表了当时滞留北方服务虏廷的大部分汉族士人的文化心态。^①

其实，不仅在十六国前期、中期民族矛盾与冲突剧烈状态下，北方士人对江南东晋王朝抱有强烈的正朔情感，即便到十六国末情况依然如此。就社会阶层而言，不仅饱受华夏文化滋养之士人如此，广大北方民众也如此。《宋书·武三王·庐陵王刘义真传》载晋末刘裕征讨关中羌族后秦政权，其返师之前，关中地方代表曾恳切挽留：“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户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

①《晋书·苻坚载记下》载前秦僧人代表道安也曾向苻坚进言，反对其南征东晋。道安虽出家，但据《高僧传·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其“家世英儒”，曾南渡至荆襄传法，后被掳入秦，深得苻坚信重。道安之劝阻苻坚南征东晋，也应当与其以东晋为华夏文化正朔的心态不无关系。对此，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八章《释道安》中有论云：“苻坚晚年，将欲南征，安数次切谏，坚终不从。按法师《阴持入经序》云：‘戎狄孔棘。’《道地经序》云：‘獯犹猾夏。’则其谏阻苻坚，或私衷不忘旧邦也。”（第157页）这也指出了道安潜在的民族心理。此外，《魏书·术艺·张渊传》载：“张渊，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自云尝事苻坚，坚欲南征司马昌明，渊劝不行，坚不从，果败。”张渊以星象向劝阻苻坚南征，也反映出当时汉人的态度。

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三秦父老之所谓“王化”、“圣泽”云云，主要是基于他们对江南汉族王朝文化正统的自觉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文化因素，尽管南北分隔已历百年，且南方正经历着王朝更迭特别是统治者由土族转换为寒人的过程，但北方士庶对南方王朝仍是一往情深。文化的潜在影响力如此深远巨大，不能不促人深思。

崔浩既为“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自然也怀有这种深沉的文化情感。相较之下，以上张宾和王猛，就其出身而言，显然不属于传统之高级文化世族，而应当属于寒门俊杰，他们入仕胡人朝廷，是出于事功方面的积极追求，特别是王猛曾坚拒东晋桓温的邀请，更是他基于对自身文化与门第身份的全面考量而作出的自觉选择，但即便如此，他们内心中依然始终怀有对故国文化的深切情感。以崔浩之家世背景与文化底蕴论，其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当更为强烈和真挚，而在当时，这一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便是对南方汉族王朝及其所承载之文化的认同。

二、崔浩劝阻北魏统治者对南朝的军事攻击计划

崔浩出自清河东武崔氏，其曾祖崔悦仕于后赵，其祖父崔潜仕于前燕，其父崔宏，字玄伯，一度入仕前秦，为西晋以来留滞中土之汉族名门大族之杰出代表。从有关记载看，崔宏对南方东晋王朝是怀有特殊情感的。《魏书·崔玄伯传》：“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崔宏“欲避地江南”，并作诗明志，这是其在民族纷争之紧张状态下所表露出来的文化寄托与归属感。崔宏进入北魏政权后，在道武帝拓跋珪时期的制度建设处于关键地位。《魏书》本传称其官至吏部尚书，拓跋珪“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崔浩为宏之长子，据《魏书·崔浩传》，“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太祖以其攻书，常置左右。”自明元帝拓跋嗣时，崔浩渐入决策层，“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及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崔浩一度成为最重要的谋士与辅政。当时北魏控制了河北地区，正逐步规划河南、关中诸地，而东晋末期，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将领势力兴起，一再用兵中土，自然与北魏发生军事接触。当时的北魏酋帅出于掠夺的心态，多主张对南方用兵。在这一问题上崔浩始终加以劝阻。《魏书·崔浩传》载泰常元年，刘裕伐后秦姚泓，其舟师欲泝河西上，“假道于国”，明元帝诏令群臣议之，外朝公卿与内朝官员一致主张不可使刘裕舟师沿河西上，而应利用函谷关天险，“勿令西过”。对此，崔浩提出自己的看法：“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姚）兴死子劣，乘其危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明元帝听从群臣意见，命长孙嵩等阻截，终为刘裕军队打败，“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

泰始二年，有人建议北魏乘刘裕西征之机，断其后路，“则裕军可不战而克”，明元帝以此问崔浩，浩以为刘裕入关灭后秦势如破竹。其英雄气概超迈时杰，无需与之争锋，但其克服关中，必然回归南方谋篡。且关中局势刘裕也很难真正稳固下来。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坐而守也”。明元帝又问是否可乘机袭击彭城与寿春等地，崔浩明确表示长孙嵩等“非刘裕敌”，且提醒西北柔然诸势力的威胁。经过细致的分析，明元帝终于放弃从后袭击刘裕的想法。崔浩的分析当然是出于对北魏内外形势的整体把握，符合北魏的战略目标。不过在鲜卑酋帅看来，这是乘机南侵掠夺的好机会，如果他们出兵进攻彭城、寿春等地，或在函谷关等地阻截刘裕，即便是游击骚扰，也必然对刘裕的北伐战略部署造成一定的影响。明元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北魏处于观望状态，刘裕顺利进入关中，取得了灭亡后秦的重大军事胜利。

泰常七年，明元帝得知宋武帝刘裕病死的消息，打算乘机南进占领河南洛阳、虎牢、滑台等要地，

崔浩再次劝阻曰：“陛下不以刘裕歟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明元帝决意南征，崔浩屡谏不止。太武帝继位后，鲜卑酋帅与晋末流亡入魏的司马氏宗室和士族人物为立功南境，不断要求北魏南征，夸大刘宋对北方的威胁。对此，崔浩坚持首先将战略重点放在解决柔然问题上，反对贸然南进。崔浩因此受到攻击，“或有尤浩者”进谗言说：“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这实际上是说崔浩有意回避南朝问题，必将给国家造成危害。不久，“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朝臣多赞成之。唯崔浩进谏，指出南镇诸将素来“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可谓一针见血。南镇诸将复表局势紧张，朝廷加强军事备战，并假署东晋亡人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崔浩表示反对，以为“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并明确指出司马楚之之徒为“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并从天文的角度论证“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云云，主张“未可举动”。太武帝不能违众意，“浩复固争”。（以上引文未详注出处者，皆出自《魏书·崔浩传》）凡此等等，在太武帝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崔浩主张首先集中力量击溃柔然，进而平定河西诸地，而南线镇将和朝中勋贵则强烈要求南征，崔浩一再力排众议，不断受到攻击。崔浩的这一主张，当然有其为北魏利益考虑的成分在内，但他一涉及南朝问题，总是与众不同，这不能不含有无以言表的南朝文化情结。崔浩遇祸后，拓跋焘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刘宋的侵略战争，这又不能不使人深切地思量崔浩的劝阻之功。

关于崔浩具有民族意识及其南朝文化情结问题，还有一则更为具体的材料。《宋书·柳元景传》载：“元景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这是柳光世南奔之后的说辞，所谓“浩密有异图”，是说崔浩虽服务于鲜卑朝廷，但一直联络乡里大族图谋造反，而崔浩之死因，则正在于“谋泄被诛”。对这一材料的真实性，历来学人皆持谨慎的态度。司马光在《通鉴》卷126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载此事，依据《魏书》而不从《宋书》，注引《通鉴考异》录《宋书·柳元景传》此段文字，指出“与《魏书》事不同。今从《魏书》”。这说明司马光等人对此是怀疑的。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引述这一材料后有论云，“则似浩以有民族意识，因而被祸者”，论者或据《魏书·崔浩传》所载其屡阻北魏南伐之议，“以证《宋书·柳元景传》而谓浩实心袒南朝者，鄙意以为此正浩之善于为鲜卑谋，非有夷夏之见存乎其间也。盖鲜卑当日武力虽强，而中国北部汉族及其他胡族之人数远超过于鲜卑，故境内未能统一，且西北方柔然及其他胡族部落势力强盛，甚为魏之边患，此浩所谓未能一举而定江南者也。若欲南侵，惟有分为数阶段，节级徐进，此浩所谓命将扬威收淮北之地者也。”陈先生又进一步分析崔浩劝阻拓跋焘缓攻南朝，“可谓深悉当时南北两方情势，其为鲜卑谋者可谓至矣。浩之父宏，对于鲜卑其心与浩无异同，今不可知，但宏之欲南奔江左，在东晋之世，北朝士族心目中以门第高下品量河内司马氏与彭城刘氏之价值，颇甚悬远，……何况清河崔氏自许为天下第一盛门，其必轻视‘挺出寒微’之刘宋而不屑谄言于鲜卑以存其宗社，其理甚明。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夷夏之见以自托于南朝，本不足据。司马君实纪浩之避祸从《魏书》而不从《宋书》，其识卓矣。”^{[1] (P151-152)} 陈先生从当时北方胡汉交融之大局来把握崔浩之心态，这是很深刻的论断，特别指出南朝寒门统治者的兴起，引起北方儒学士大夫南朝情结的淡化，可谓独具只眼。不过，北魏前期胡汉民族之间文化隔阂和差异依然存在，崔浩最终正是死于敌视汉化之鲜卑保守势力之手，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尽管柳光世所说崔浩“密有异图”未必属实，

尽管崔浩在门第上看不起南朝新统治者彭城刘氏，但在南北朝的直接军事对抗中，崔浩没有一点“民族意识”与“南朝情结”，恐怕是不可能。^①对此，钱穆先生的看法颇值得重视，他在《国史大纲》中引崔宏欲南奔东晋之史实后说：“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都有此，须深观。”^{[2](P368)}这种“种姓”就是汉族之门阀士族高贵的文化特性，南朝政权虽下移于寒门，但文化仍存续于门第之中，因此，南北士族共同的文化基础依然存在。

对于崔浩以江南为文化正统所系的心态，宋人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有一段论述颇为深刻，他说：“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故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攻，而天意佑华，亦不可以厚诬其实。”所谓“天意佑华”自不可信，主要在于东晋南朝延续着华夏文化的血脉，这对留滞北方的汉族人士依然具有感召力，崔浩之言行正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力量。

总体说来，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土文化士族甚至一般文士对南朝之政治地位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究其根源正在于其文化上认同意识，尽管随着北方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这一感情逐步淡化，但终究难以泯灭。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酈道元”条所析酈道元对南北朝君主的态度可以作为有力之旁证。据周先生所考，酈道元在《水经注》“所表露对于南朝人物之态度，则颇堪注意”。如其中对十六国诸君主，“无一人不直呼其名”，即便其祖辈仕于后燕也如此，“此其对五胡君主之态度也”。而对南朝诸帝则“皆称庙号”，称萧赜为萧武帝，称刘裕为宋武帝、刘武帝、刘武王、刘公、彭城刘公等，“要之，善长书中此种称谓，有似两晋南北朝时人对曹操之或称魏武，或称曹公，时而尊敬，时而亲昵。《水经注》中于刘裕之西征长安、北征广固，亦屡次道及，流露崇敬赞叹之意。道元所见南朝地理书似不多，而随刘裕西征之戴延之、郭缘生，以及同时人刘澄之所撰之《西征记》、《述征记》、《续述征记》、《永初记》等屡见征引。论者每推测崔浩虽仕于北朝，而对南朝颇多眷恋。高欢则明言吴儿老翁所为北方士大夫所向往，同为衣冠礼乐所在之地。酈道元之态度颇可与高欢之言相印证。”周先生于细微处揭发酈道元著书中所体现出的南朝文化情结，可谓发人所未发，颇为深刻。酈道元所处之时代已是北朝后期，比崔浩又晚为数十年，他依然在文化上对南朝颇多认同，那崔浩这方面的感情更为强烈，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三、崔浩与流亡北魏之南朝人物之交往及其对江左文化之吸引

崔浩父子进入北魏政权，深得拓跋氏统治者信任，成为推动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代汉化的北方儒学士族之主要代表，在他们的努力下，及至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北魏不仅国力强盛，而且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汉化高潮。《南齐书·魏虏传》在叙述“佛狸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之后，便谈孝文帝拓跋宏之汉化，可见当时人已看出拓跋焘时期之汉化奠定了此后北魏进一步汉化的基础，这是很有见识的判断。而拓跋焘之汉化主要有赖于崔浩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崔浩除了大力援引中原士族进入北魏政权，还大力保护和举荐“外国远方名士”。对此，《北史·崔宏传附子崔浩传》载：“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远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于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然主要指太武帝拓跋焘征服河西凉州地区后迁入平城的名士，但其中也包括当时流落北魏的南朝人物，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

^①从北魏统治者的角度看，他们最嫉恨的也是北方士大夫怀有尊崇南朝的心态。据《魏书》卷47《卢玄传》，卢玄孙卢度世因崔浩祸逃亡，太武帝怀疑其逃奔南朝，后南征，问刘宋使者曰：“范阳卢度世生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当得知“当必不至”后，拓跋焘立即下令赦免“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书侍郎，袭爵”。如果卢度世果真逃亡刘宋，其家族的灾难一定更加沉重。可见，当时鲜卑统治者对北方士大夫的南朝情结十分敏感。从其反面说，正是由于当时北方士人比较普遍存在着南朝情结，使得北魏统治者有这种敏感的心理。

源略论稿·礼仪篇》中引述这一记载后有案语云“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中袁式便是当时由南入北士人之代表。

晋、宋易代之际，一部分东晋司马氏、受迫害的士族人物和军事将领先投奔后秦姚氏，后归附北魏。《魏书·太宗纪》泰常二年八月下载：“刘裕灭姚泓。九月癸酉，司马德宗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息譙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马国藩、司马道赐，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璉及桓温孙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来降。”此后，仍陆续有一些南人北奔入魏或因战败被俘入魏。^①可以说，在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形成了一个南人北奔的高潮。当时，正值崔浩辅助两位拓跋氏统治者进行汉化改革，而提携和重用南士，正是崔浩汲取南方文化以促进北魏汉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对北奔之南人，崔浩主要交结的对象是一些了解汉魏典制或代表南方文化的文士和门阀士族子弟，而对那些东晋宗室子弟和北奔之武人，崔浩则少有交往，如对怱怱北魏统治者在军事上攻击南朝的司马楚之等人，径称之为凡庸“琐才”，即便获得一点局部的战利，但最终于大局无补。与此相反，崔浩对一些文士则重视有加。《魏书·袁式传》：“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谥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有草创，恒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飘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谥议。……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袁式之所以“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原因在于崔浩当时正为北魏制定“朝仪典章”，袁式“博于古事”，故崔浩借以取法江左典制。《魏书》卷38传末有论云：“袁氏赞礼崔浩，时称长者，一时有称，信为美哉。”所谓“赞礼崔浩”，就是指他协助崔浩制定朝仪制度。《北史》卷27传论称“（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也是说得这一方面。

《魏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为荥阳阳武人，其家族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崔浩与其交往颇密：“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之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挝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修之谓浩言为然。”毛修之“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故崔浩“每推重之，与共言说”，目的正在于了解魏晋以来典章文物制度。《宋书·毛修之传》载：“初，荒人去来，言修之劝诱（拓跋）焘侵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太祖甚疑责之。”这里说毛修之向拓跋焘传授“中国礼制”，具体情况不甚清楚，^②但崔浩“与共论说”，无疑与礼制建设有关。毛修之甚得拓跋焘信重，很可能与崔浩的推荐有关。

崔浩援引南士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王慧龙。据《魏书》卷38《王慧龙传》，慧龙自称为太原王愉之孙，太原王氏为东晋一流士族门第，因与刘裕有隙，“愉合家见诛”，年幼的王慧龙北奔，最终入魏。^③

①《魏书·司马休之传》对此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记载。对于当时相继北奔入魏之南人及其类型等，拙文《北魏之南朝流亡人士事迹考述》（刊于《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有比较全面的考察，敬请参看。

②《魏书·毛修之传》载“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他常在太官，当然也会涉及礼仪方面的问题。

③《魏书·王慧龙传》记载王慧龙的家世，称“自云太原晋阳人”，载其北奔之过程又说“其自言也如此”。这是因为有南来东晋亡人鲁爽等说王慧龙是沙门僧彬私生子。对此，慧龙后人指责魏收作秽史，引起轩然大波。（见《北齐书·王松年传》）《北史》虽删除“自云太原晋阳人”的说法，但依然保留“其自言也如此”一句。关于慧龙身世，实难确证，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的相关考证。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魏书》部分有一则札记云，“慧龙之为太原王愉孙，盖无可疑”，“夫以慧龙志节如斯，而任情污蔑，收之秽史，诚可恶也。《北史》尽削此等语，可称为卓识。”其中论证所载鲁爽等人与慧龙关系的材料前后矛盾，可参考。

崔浩在魏太武帝世推进汉化，其最重要的举措是“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魏书·卢玄传》）即在北魏恢复世族门阀制度，确立汉族大族在社会政治诸领域的优越地位和特权，这比之推荐一些汉族士人入仕或具体的制度调整而言，这种以文化和家世确立地位高下的制度变革，其对北魏社会的促动是带有根本性的。相较而言，北方地区自十六国以来，诸胡统治者相继入主中原，其社会发展多处于部族阶段，对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难以接受，尽管像苻坚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九品中正制度，但远不能与东晋之门阀制度相比。因此，崔浩企图在北魏“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当然要取法南朝。前述崔浩与武人毛修之交结，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先人乃“中国旧门”，崔浩借以提倡门第精神。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便是王慧龙。《魏书·王慧龙传》载：“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结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虬鼻，江东谓之虬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及鲁宗之子轨奔姚兴，后归国，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浩虽闻之，以女之故，成赞其族。慧龙由是不调。”崔浩作为北方第一门第之代表，而王慧龙仅为一介南来亡人，孤立无援，崔氏竟与之通婚，先赞其“信王家儿”，后叹其“真贵种”，并一再“向数公称其美”，其目的在于彰显门第精神。崔浩对王慧龙之门第确信无疑，大力扶持，如王慧龙独子宝兴之婚姻也由崔浩操办。《魏书·王慧龙传》载：“宝兴少孤，事母至孝。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崔浩将自己的外甥女与王宝兴指腹为婚，后来又亲自主持他们的结婚仪式，使王慧龙父子与北方盛门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结为婚姻联盟，进一步巩固了王慧龙家族在北朝的基础。崔浩之所以如此奖掖王慧龙父子，不仅仅是一般的“叹服南人”，根本目的在于推崇南朝的门阀制度与门第精神。^①对此，以长孙嵩为代表的鲜卑勋贵是很敏感的，他们向拓跋焘告状，指责崔浩“叹服南人”，“讪鄙国化”，可谓一针见血。对于王慧龙本人，鲜卑勋旧则一度予以压制，甚至污辱他并非太原王氏嫡传，使其“由是不得调”。作为北方士族之领袖，崔浩内心中怀有强烈的门第精神，而这种门阀制度与文化传统最完备之内容及其形式都存传于东晋南朝，崔浩既以“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为己任，必然要“叹服南人”。这正是蕴藏于崔浩内心最深层的“南朝情结”之所在。

综上所述，崔浩作为北魏前期汉族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尽管其不遗余力地为北魏规划和执行统一北方之军政大略，但与当时大部分留滞北方、服务于虏廷的汉族士人一样，其内心里仍具有深沉的“南朝情结”，这不仅表现为具体军事问题上对南朝的偏袒与开脱，更主要的则出于对南朝文化正统地位的羡慕与认同。不仅如此，在太武帝时期，他大力提携包括江南亡人在内的“外国远方名士”，甚至“叹服南人”，其目的是通过他们转输汉魏以来之典章文物制度和“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门第精神，以推进北魏的全面汉化。从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出现了一个南学北输的小高潮，究其原因，正与崔浩交结南士及其变革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崔浩与寇谦之[A]. 金明馆丛稿初编[C].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对此，陈寅恪在《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精辟的分析，太原王氏是魏晋以降首屈一指的显门，有着北方一般家族难以企及的“家资”，“北魏初年，东晋一流甲族入北者罕有其人。因此，王慧龙虽既无根基，又无功业，但对于以‘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为政治理想的崔浩来说，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珍。”（第124页）